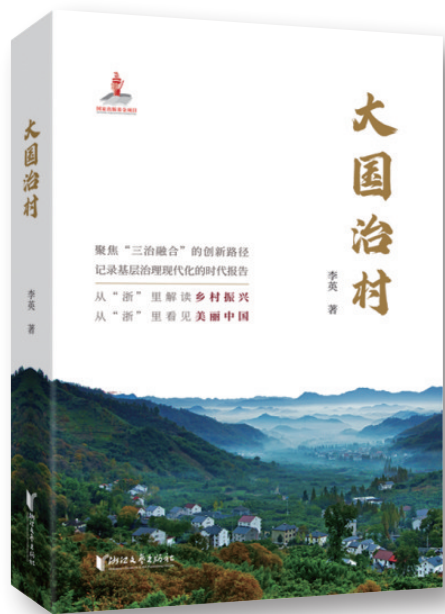


重点
阅读

美丽乡村建设中的深情表达

□李炳银



权利、所发挥的作用,充分激发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创造伟力。”

令人十分高兴和欣慰的是,报告文学作家李英非常敏锐和自觉地承担了表现人民群众在家园建设发展中的意愿、创造和经验的有历史和现实意义的写作。这部《大国治村》,正是李英投身浙江乡村建设大潮,对几个具体的乡村深入采访之后,提供给读者的真实生动的故事与变化巨大的图景,令人振奋,感慨良多。相信这部作品,在浙江,乃至在全国各地开展乡村文明建设的过程中,会给人许多启发和实际的帮助,对于推进乡村治理和改变中国乡村面貌也能发挥很好的作用。因此,这部作品不仅在文学创作方面具有价值,在通过文学热情积极地融入时代,生动地书写新鲜的中国故事等方面,都有很好的示范性。

《大国治村》真实生动地描绘了武义县的后陈村,如何在胡文法等人的组织领导下,在村民的支持下,建立村务监督委员会,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将一个贫穷、村务混乱、“前腐后继”、矛盾不断的上访村,建设成了经济发展、邻里和谐、人心思进、环境优美的新农村。“后陈经验”受到国内外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甚至影响到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作品同样真实生动地描绘了永康市塘里村,在毛遂自荐的村党支部书记孙朝厅的领导下,解决了村子群龙无首、矛盾堆积、环境脏乱、各项事业发展迟缓等问题,将德治融入美丽乡村建设之中,创造性地利用本村的历史文化特点,改造老旧房屋,发展旅游产业,使原本沉闷郁结的塘里村充满生机活力的情形。作品还真实生动地描绘了东阳市花园村,在邵钦祥的带领下,坚持走乡村工业发展之路,根据社会环境的变化不断调整产业结构,采用“村企合一、共同富裕”模式,开创性地建立村级工会,加强自治发展,在成功开发红木家具、生物医药等项目的基础上,努力开展文化建设和旅游产业,使过去“村名花园不长花”的花园村变成如今各业兴旺、花团锦簇、和谐富裕、一派繁盛的景象。作品真实描摹了淳安县下姜村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成为几任浙江省委的基层联系点,通过近20年的发展,形成了

精准扶贫的“下姜模式”,成为中国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典范。作品还抒写了杭州市临安区上田村发生的细微而又巨大的乡村变革,它是浙江省农村文化礼堂的发源地,又是浙江省第一个“微法庭”的诞生地,成为“枫桥经验”的升级版,成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实践者和获益者。后陈、塘里、花园、下姜、上田村的新旧变化,使人感受到了时代的潮流,同时也具体深刻地感受到了民间的智慧和力量。它提醒我们,在社会建设发展的过程中,必须重视和及时认真地总结基层的创新成果。联想到当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农民的“大包干”行动,再看上述这几个村子的巨大变化,就非常强烈地感受到,基层很多源于实际的治理思路和建设法则,也许比有些凭空设计出来的机械简单的所谓“蓝图”更加富有价值。因此,《大国治村》提供的这些真实、生动、形象的典型案例,非常具有学习参考价值,是活的榜样,是十分生动的乡村治理教材。

报告文学是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生长的文学根苗,是在与社会生活相依相伴中成长和发展起来的。李英的报告文学创作,很能够说明这一点。从和朱晓军合作创作《让百姓做主》开始,他就一直将关注的目光投向现实的社会生活,在生活中发现创作的题材与对象,寻找前沿的苗头和现象,并及时将这些发现、感受和认识真实地表达出来,扎根深,接地气,独特新颖,富有社会影响力。中国的文学创作,一贯主张“文以载道”“经世致用”。这是一种偏重内容价值的文学主张。它虽然不放弃文学艺术的方法与形式的追求,但明显更注重作品参与和影响社会生活的内容价值。报告文学这种经世致用的途径,在真实的社会生活表达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李英的这部《大国治村》,正是体现报告文学这些独特品质的很好例证。作品用真实质朴的语言对乡村振兴中的实践者进行描绘,充满钦佩,透出热情,对很多故事的叙述,对很多人物的刻画,令人印象深刻。

优秀的文学作品,总是因为作家紧密地投身社会生活中而富有生命力和价值。我想,《大国治村》也有这样的质地和特性!



理想与命运的交响

——评石钟山长篇小说《五湖四海》 □王 干

石钟山的长篇新作《五湖四海》以农村青年刘天石参军、转业、创业的人生历程为主线,展现了近30年来中国社会的变化和迁徙,塑造了一个具有理想主义情怀的军人形象,讴歌了青春在奋斗中的光辉和价值,是一部传递正能量弘扬英雄主义精神的好作品。新的时代需要新的文学,也需要展现新的理想价值。《五湖四海》通过一个普通农民、普通士兵的人生奋斗史,说明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依然是时代的主旋律。

农村青年刘天石的父亲是吹喇叭的,在乡里乡外有些名气,他的两个儿子刘天左、刘天右也跟着他学吹喇叭,如果不是后来参军的转机,刘天右可能一辈子都在靠山屯里像父亲那样终老。应该说,一开始命运是青睐刘天石的,当时参军他哥哥也是可以去的,但是阴差阳错的抽签让他去了部队。刘天右去了部队以后,本来正常的节奏是要复员回到村里继续当农民的,但因为要教首长的女儿付瑶学吹奏小号喇叭萨克斯,他被秦参谋看中提干留了下来。而热爱音乐、具有理想主义梦想的付瑶又看上了刘天右的艺术才华和人品,充满了热恋。

这样的情形,是刘天石做梦也没有想到的,爱情、事业、机遇给了他一片蓝天,但随之而来的变奏确实阴云密布,让刘天石的命运急转直下。付瑶的爱,温暖激动着刘天石的心,但遭到了她母亲的坚决反对,一出现代版的“梁祝”上演了。为了拆散刘天石和付瑶的爱情和婚姻,一张无形的手让刘天石远离了军区机关,离开

了他心爱的文工团,被分配到边疆大风口,之后又转业到地方工作。刘天石由于看不惯外贸公司贪官的做法,又愤怒地离职,自己下海创业,创业的艰难和煎熬让刘天石感受到世态炎凉。妻子又在难产中去世,可谓人生的噩梦在一夜之间降临。最后还是部队战友的鼓励和帮助让他摆脱了生意上的困境,也让他在逆境中奋起。创业成功之后,他不忘初心,出于对音乐的热爱、对部队生活的怀念,他创办了迷彩乐队,重新奏起当年中断的乐曲,续上了年轻时的梦想。同时,付瑶也因为婚姻的无爱而离婚了,中断的爱情又看到了曙光。

石钟山的小说善于描写军人,也善于洞察人性的幽微。刘天石和付瑶的爱情悲剧,在以往的小说里,容易将其归结于某种不良的势力或者不良的动机。付瑶的母亲王香梅反对刘天石和付瑶的爱情,却是出于一种善意,她是担心付瑶婚后的生活不幸福,因为她和秦参谋长的婚姻就是如此。由于城乡差异产生的隔阂,尤其是秦参谋长下乡亲戚的各种“骚扰”,让她始终过得很纠结,所以她不想让自己的宝贝女儿重蹈覆辙。

石钟山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人的幸福感尤其是婚姻的幸福除了两情相悦以外,还与周围的环境、周围的人群、周围的文化有关系,当然王香梅的简单类比导致了刘天石和付瑶爱情的悲剧,但王香梅的担忧也不是全无道理。假设当时付瑶和刘天石心想事成、结为连枝,会不会也出现王香梅的尴尬呢?小说里也婉转地写到了刘天石到城里工作的不适应、不习惯,当然这是付瑶没有在场情况下发生的生活当然不能假设,失去的爱情总是美好的,刘天石也正因为爱情的悲剧才更加努力,才更加追求自己的理想。《五湖四海》里刘天石爱情和婚姻的曲折,正是砥砺刘天石为理想奋斗的磨刀石,而人民解放军大熔炉的锻造,让刘天石的青春不落庸常之辈的世俗生活,生活苦难的盐会让人生的幸福味道更加丰富。

石钟山在小说里写到了文化格局对人的制约,也写到人在困境下对新的文化视野的追求和探索。我们在城市文明和乡村文明的冲击和碰撞下,新的时代才会到来。每个人的命运在时代的交汇点上,才会闪耀出熠熠的光华。“五湖四海”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也是文化意义上的,无论是乡村文明还是城市文明,无论是军营文化还是社会文化,无论是个人的奋斗还是群体的努力,只有汇入到时代的大潮中才具有真正的价值和意义。《五湖四海》在书写刘天石的个人奋斗和个人命运的同时,也为时代交出了一张颇具哲思的答卷。

■新知新思

张雄文长篇报告文学《潮卷南海——深圳风雨一百年》

书写深圳崛起之魂

□梁瑞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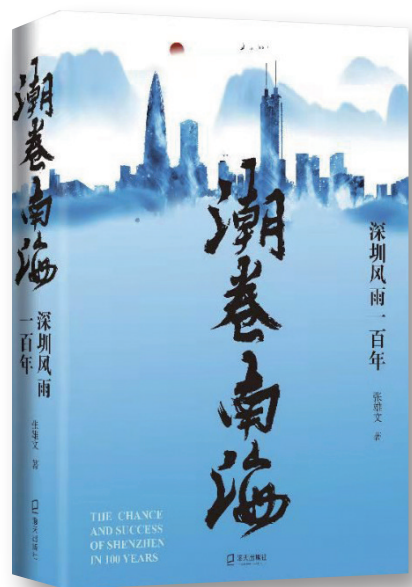
作家张雄文在当下湖南文坛算是后起之秀,却十分扎实而勤勉,埋头耕耘于散文、报告文学等领域,近年来屡有不乏影响力的佳作问世,令我这个老乡十分欣慰。不经意间,他又捧出了一部出色的新著——长篇报告文学《潮卷南海——深圳风雨一百年》。这部36万字的煌皇之作,可以说是一幅深圳百年铁血交织、潮起潮落、风云际会的绚烂长卷,也是一部中国共产党百年带领深圳人民翻天覆地、震惊世界的精彩华章。

蛇口荒岭上一声炮响,将深圳这个寂寂无闻的小镇推向了世界的聚光灯下。而后来所创造的深圳速度、深圳效率、深圳奇迹,更是魔幻般演奏着中国改革开放最精彩的进行曲。横空出世的深圳,也成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造城杰作。如果说这一华美乐章是中国人民伟大创造力的合奏,那么,中国共产党则是这一合奏的总指挥。

《潮卷南海——深圳风雨一百年》一书,生动而真实地再现了深圳百年巨变,倾情演绎了共产党人在深圳筚路蓝缕中的“群英谱系”,揭示了深圳神奇般崛起的历史脉络和根本原因。

深圳40年间的巍然崛起,无疑得益于改革开放。然而,本书站在更高的视角、更大的历史跨度、更遥远的历史维度寻迹觅踪,探究深圳奇迹产生的必然逻辑和内在成因。作者以精彩的文笔和恢弘的气势,将改革开放40多年和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的历史联系起来,甚至将这场伟大改革延伸到上百近千年。从文天祥的铁笔丹青,到林则徐的抗英销烟,再到宝安(辖深圳)早期共产党人领导的农民运动,该书用一幅幅生动而真实的画卷,展示了这片土地的深厚历史积淀和回肠荡气的英雄之气。这种联系绝不是牵强附会,而是从历史的纵深、从潮起潮落中涉沙披金,用众多鲜活的事例证明共产党人在历史大潮中的中流砥柱作用。书中描摹了许多立于潮头、无畏风浪、“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共产党员形象,他们在深圳的百年风雨中冲锋陷阵,将个人荣辱得失置之度外,表现出共产党人泰山压顶不变色的英雄气概。正是这种压倒一切敌人的无畏精神,才使深圳党组织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也使深圳从一个边陲小镇,成为引领全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也成为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国际化大都市。

尤其可贵的是,《潮卷南海》一书在展示深圳



百年伟大工程时,不回避矛盾和斗争,既真实表现党坚如磐石的意志、牢不可破的团结、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也反映了守旧与创新、开放与僵化、教条与解放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历史的经验反复证明,我们党之所以朝气蓬勃、青春焕发,是因为在伟大斗争中吐故纳新,在不断纠正自身的错误中不忘初心、找准航向。《潮卷南海》以事件为中心,以人物为素材,还原历史真实现场,既增强了历史的代入感,也增强了文本的感染力,可信、可感、可思。

历史是由人民抒写、由人民创造的。深圳的崛起所表现出来的人民的首创精神、巨大热情、磅礴力量,再次证明了这一理论的正确性。如果我们对此一论断本质探究,从《潮卷南海》一书中,我们不难看到星星之火在燎原中的作用,定星舵盘在航海中的依仗,压舱石在惊涛骇浪中的安稳,中流砥柱在洪流险象中的镇定,这是在急流险滩中穿行的船魂。从本书所描述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群英谱系”,也不难看到深圳这座城市的崛起之因。

“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汇聚人民群众的伟力,将改革成果惠及千家万户,深圳的未来,一定会演奏更精彩华章。同时我相信,作家张雄文也会站在《潮卷南海》一书的山峰上,冲向另一座更为险峻的文学之峰,取得更为灿烂的文学硕果。

■开卷絮语

一部书,冲洗出万千影像

——评鲁顺民、陈克海的《赵家洼的消失与重生》 □张二棍

许多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当下即历史,当下即我们明天的回忆。因此,记录和书写当下是作家的重要责任。之前,鲁顺民与陈克海两位作家,并肩走过几十个贫困村,查访了近百个贫困村,栉风沐雨,入户采访调查,呕心沥血耗时经年,以一部鸟瞰式的纪实文学《掷地有声》,描摹出近些年来山西精准扶贫工作的整体风貌。这部作品写出人所共知的壮丽,也写出诸多不为人知的艰辛,更写出无数可歌可泣的扶贫人与脱贫事。继《掷地有声》之后,鲁顺民与陈克海又策马扬鞭,以一个更微观、更细腻、更动人的切口,写就这部200余页的报告文学《赵家洼的消失与重生》,来为一个村庄谱曲,给几个扶贫队员画像,替一群需要被关怀和被帮扶的乡村人说出他们的喜怒哀乐。这种写法与《掷地有声》不同,它不是广撒网,而是深聚焦。

这样一部紧贴时代脉搏、详述村庄故事的书,读者自然想看看两位作者如何一笔一画勾勒、着色,使书中人物各就其位,如何把一个个具体的数据,转化成一段段清然而又欢快的故事。在作品中,无论是贫困户,还是扶贫工作队,无论是受访者知无不言的平静口述,还是两位作家言无不尽的精彩叙述,都紧扣着报告文学应有的真实与真诚。我们看见,所有的受访者,经过两位作者的深度挖掘,连他们前几代的来处、前半生的遭际,都展现得一清二楚。当这么多人的命运聚拢在一个贫穷凋敝的村庄里,当诸多的现实困境与历史原因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座村庄里这些主要角色形色的“穷”。

是的,在《赵家洼的消失与重生》一书中,“穷”以及如何走出“穷”才是主角。两位作者把视线贯注在需要帮扶、需要带领的这些贫困户,以及他们脚下的这方水土之上。无论是频繁出现在陈福庆《民情日记》里的刘福有、极端贫困的王大娘,还是“好受苦人”的杨玉才、喜欢用四六句自我励志的曹六仁……他们在《赵家洼的消失与重生》中都是一个饱满而独立的人物,两位作者饱含深情地给予他们足够的文字篇幅。他们既是被书写的对象,也是脱贫的见证者。他们既感知了几位扶贫队员的赤子真情,也参与和推动着脱贫工作的进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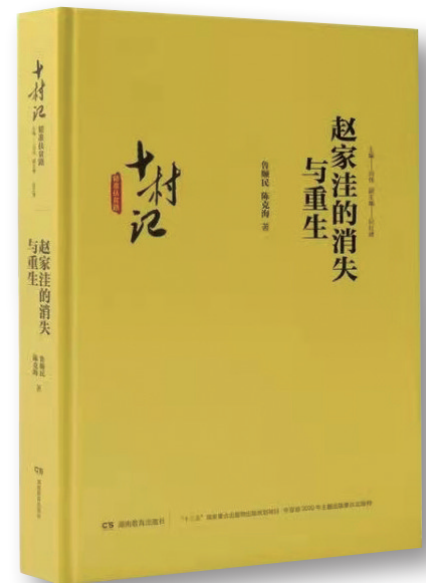
在这个村庄里,肉眼可见的贫困仍然是那些血脉宗亲的敌人,而帮助他们安居乐业、衣食

无忧,就是我们最后的胜利。在书中,由两老两少组成的驻村工作队呈现出务实的品质。是的,书中的这支驻村工作队,只是众多工作队中的一支。他们是推门就“大爷大娘、叔叔婶婶”地叫着的人,是认真观察、侧耳倾听的人,是帮扶户一天不见就着急的人……于细微处见真情,在平淡中显本色,《赵家洼的消失与重生》就这样把一个个无微不至的细节串联起来。

更难能可贵的是,《赵家洼的消失与重生》一书虽以时序结构全书,但作者并没有掉入“过去如何如何、现在多么多么”这种陈旧的叙述陷阱。他们的写作中,时刻充盈着一种冷静的关怀。有了这份冷静的关怀,《赵家洼的消失与重生》才会利用数据,而不倚重数据。在这里,无论是受访者的口信,还是扶贫队员的羽翼,扇动起一团团让读者为之着迷的云朵。

人无忧患不立,作家在写作时同样需要时刻保持一种警醒和危机。一部成功的报告文学作品,我觉得不应该只是记录下什么,还应该看你在记录的背后显现了什么。这显现,是让幕后的走向台前,于漆黑中发出光芒,于无声处缔造惊雷。好的作家,应该是一次次冲洗底片的人,是在文字间还原、复活事物,让万事万物在书中各得其所……《赵家洼的消失与重生》在叙述上不偏不倚,无论是帮扶对象,还是驻村工作队,无论是已经远离赵家洼的老少乡亲,还是埋骨在此的祖辈先人,两位作家都着墨、上色,使得“赵家洼”成为一个集结了所有时空的寓言般的存在,甚至可以说,作为“一斑”的赵家洼,体现的是整个晋西北乃至整个山西贫困地区的“全豹”。

两位作家有心的是,书中处处可见的民谣、谚语、诗句,作为点缀的闲笔,却笔笔不闲,句句生风。在谈笑间,活灵活现地勾勒出巨大时空下,一代代乡民不可知的酸甜苦辣。譬如引用诗人公木的“三月三,三月三,春风不上崂山岗……”来述说这里的气候。比如引用谚语“二姑舅啊三姑爷,三亲六眷漫缓缓”来形容我们的先人为了摆脱贫穷,居无定所、随风游走,最后却陷入更不可知的潦倒之中……许多时候,正儿八经的严肃叙述,往往不及这貌似漫不经心,却饱含着无数酸楚经验和悲



凉见闻的几句闲话。

每一位作家的使命,无非是栖身于自己的时空之下,写出一部为自己“换血”、替他人“续命”的超越时空之作。这种超越,不单纯是作家对个体的超越与突破,不单纯是文本意义上的一次实验,以及社会意义上的一次突破。所以,蜻蜓点水式的文学,注定是短暂和无效的,我们的时代呼唤霸王举鼎式的文本。对报告文学而言,必然承担着对整个时代更加宏阔的、对人性更加精微的透视。我们的报告文学,需要兼具人文关怀与人性批判的多重使命。

读完《赵家洼的消失与重生》一书,我仿佛在无尽的时空之间穿梭往来,感知着凛冽与温暖的交织。让我凛冽的,是那些客观的历史、地缘形成的贫困,以及这贫困给那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带来的伤害。而让我温暖的是,这个村庄的贫困没有被人们遗忘,在各方力量的帮助下,这里的人们正在努力地走出贫困。两位作者的书写,也没有局限在现场和当下,没有仅仅定格和聚焦于此,而是一次次把目光从“赵家洼”衍射向四面八方,在更广阔辽远的地方游弋、审视、探索、求证。也许,这也是《赵家洼的消失与重生》更有意义和价值的地方吧。

写作,不仅考量一个作家的取材、视角,更考量写作者的情怀。尤其就报告文学而言,向谁报告必然是一个值得深思熟虑的问题。“走过全省23个贫困县,走访近百个贫困村,入户数百户贫困户采访,直到书稿完成,赵家洼仍然惦记心头,不能忘怀……”在后记中的这段话,可以看作两位作者的心声。我不清楚,是什么让二位如此惦记,而他又惦记着什么。但我知道,他们的报告对象是家国、苍生、天地。